

# The Indigenization Research of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Motivity, Connotation and Approach

Chunlong Huo

*School of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china*

*Email: chunlonghuo5555@163.com*

**Abstract:** The rethinking to the identity crisis of Chinese administration that some scholar have done make a chance for the indigenization research of Chinese administration. It is a precondition that we should analyze the motivity, connotation and approach of indigenization research. So, 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 the motivity from the background of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 define the connotation of indigenization research; at last, we discuss the approach of indigenization from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Keywords:** Indigenization; Research; motivity; Connotation; approach

##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公共行政本土研究： 动力、内涵与进路

霍春龙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兰州，中国

Email: chunlonghuo5555@163.com

**摘 要：**中国公共行政学者对于公共行政“身份危机”的反思为公共行政本土研究提供了契机。在本土研究过程中，对推动本土研究的动力、本土化内涵及其进路的分析是进一步开展本土研究的前提。文章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入手探讨和分析推动中国公共行政本土研究的动力；从全球化与本土化关系角度分析了公共行政本土化的内涵；最后，文章从学者的学术自觉、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角度分析了进行本土化研究的进路。

**关键词：**本土化研究；动力；内涵；进路

### 1 引言

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推动了当下或未来中国公共行政本土研究？中国学者在公共行政本土研究中做了哪些工作？我们如何理解公共行政本土研究，如何开展中国公共行政本土研究？

### 2 本土化研究的动力

对推动本土化研究动力的分析是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理论上说，任何理论研究都有其固有的动力或动机。对研究者研究动力或动机的探讨，能够从深层挖掘研究者的前提性预设。德国心理学家卢

因（Lewin）的群体动力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决定于内在的需要和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是内在需要和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的结果。[1]按照这种卢因的动力学理论，我们可以发现，推动中国公共行政本土研究的动力大致有以下几个：

(1) 中国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与 30 年经济高速发展提升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在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中，中国一直作为一个边缘国家而存在。自 1840 年以降，中国发展处于世界主流国家发展的后面。救亡图存、自主、图强一直是中国国家的主题。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强大的实力，反观中国落后挨打的残酷现实，在学习西方国家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即无论西方国家的科技实力还是文化都比中国具有先进性。所以，我们一直以学习西方先进

---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批准号：09YJC810020。

的文化和经验来要求自己。在我们的头脑中，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已经成为制度化权威正当性观念。处在边缘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容易在学术上产生外倾依赖性。

[2]

亨廷顿认为，当文化和意识形态被看作是根植于物质上的胜利与影响时，那么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就被认为是有吸引力的。<sup>[3]</sup>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创造了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中国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在经济的高速的增长过程中不断增强。中国正不可阻挡地崛起在实际民族之林。随着“北京共识”的达成，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人们突然意识到中国模式的存在及其现实意义。第三世界国家认识到，所谓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和政治管理模式并不一定适合发展中国家。对于走向现代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也许是替代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的第三种模式。<sup>[4]</sup>中国模式崛起的现实激起了学者们的反思，继而“中国模式”也开始被人们所认知并加以深刻的探讨。中国模式崛起这表明，随着政治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以及政治经济模式并不比发达国家的差。中国模式的崛起使得中国学者激起了强大的自信。同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政治的稳定凸显了中华文明的优越性，激起了内在学者心目中那种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正是这种根植于学者心中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推动了中国公共行政本土研究。

(2) 全球化的挑战激起了学者自觉的主体性反思。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进入了全球化的世界结构之中。全球化作为一种外在的压力和挑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和合法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sup>[5]</sup>也对中国公共行政的自主性产生了深刻影响。<sup>[6]</sup>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些敏锐的中国学者意识到，全球化对于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之未来发展的深刻影响和挑战。在积极融入全球化的呼吁中，有学者开始自觉地的反思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应该占有的位置，强调中国要以“主体性”为基础认识和融入全球化。<sup>[7]</sup>

在公共行政领域，公共行政学者们对于公共行政本土研究的主体性反思体现在对中国公共行政身份危机的认识上。随着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不断发展，有学者开始对中国公共行政知识产出的质量做出反思性评估<sup>[8]</sup>。中国公共行政学身份危机主要体现在认同危机上，“我们的研究是都得到了国内学术界其他学科同行的认同？是否得到了国外公共行政学同行的认

同？”<sup>[9]</sup>可见，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公共行政研究不仅具有地方性，同时具有了世界性。然而，在当下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中，中国仍然处在边缘位置。全球化对于中国而言，更多地是挑战，因而，融入世界主流是未来中国公共行政知识产出的一个主要目标。在应对全球化的过程中，学者开始进行自觉的主体性反思：中国本土化研究不仅为中国公共行政的实践和发展做出贡献，还要从全球着眼，为世界公共行政知识体系的构建做出自己的贡献。一味地移植西方公共行政学知识体系不仅无益于中国公共行政实践的要求，也无益于中国公共行政自主地融入世界公共行政知识体系，为世界公共行政知识的构建提供帮助。这种自主性的反思为推动中国公共行政本土研究提供了条件。

(3) 公共行政本土研究是中国公共行政学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积淀也是中国本土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背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指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社会重建的需要使得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有学者指出，我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表现为以官僚体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行政行为成本高而透明度低、公共行政目标缺少战略思维、公共行政产出无标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sup>[10]</sup>理论脱离实际，<sup>[11]</sup>面对公共行政理论的不足，“中国社会转型对中国公共行政，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行政实践，都提出了一个最大的挑战：如何建立与发展与社会变革相适应的公共行政。”<sup>[12]</sup>可以说，中国公共行政实践的需要是中国本土化研究的内在动力。

综上所述，推动本土化研究的主要动力在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学者们在公共行政研究过程中，针对中国公共行政的实践需要以及中国公共行政研究所做出的高度自觉的反省和批判意识。

### 3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公共行政本土化的内涵

张成福认为，<sup>[13]</sup>公共行政的本土化或者中国化，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使公共行政的研究具有中国特色；二是公共行政学要更加关注“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使公共行政的知识与理论与中国社会发生密切的关系，根植于中

国并为中国所用。芮国强则认为,<sup>[14]</sup>本土化是一个复杂的、流变的概念,本土是和国家、民族与地方等概念相交织甚至重叠的。尽管学者们已经就本土化的内涵做了一些研究,但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学者们对本土化研究的内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这可能与公共行政研究中心的“非中国化”有一定的关系。<sup>[15]</sup>似乎也与公共行政学者实证导向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学者不主张在基本概念上争论,认为这是一种无味的学术游戏,强调侧重点应该突出公共管理案例的实证分析本土化的含义。<sup>[16]</sup>然而,从学术角度来说,对公共行政本土化内涵的界定是公共行政本土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日后推进和评估公共行政本土研究的重要标准。本文不打算给“公共行政本土化”做严格的概念界定,仅仅探讨公共行政本土化的内涵和特征。我们认为,公共行政本土化大致有以下基层涵义:

(1) 公共行政本土化内涵着本土化与全球化的矛盾和张力。首先就全球化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都是以开放的心态开展国家建设。面对发达国家具有“生机控制性”文化的冲击,<sup>[17]</sup>向国外学习并“与国际接轨”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特别是在中国加入 WTO 后,中国社会科学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世界结构,成为世界社会学术体系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全球化不断发展背景下,中国公共行政研究走向国际化是中国公共行政发展的必然趋势。此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很多既具有国际性又具有本土性的全球化议题,比如环境问题、贫困问题和恐怖组织问题等成为公共行政必须关注与解决的实践问题。这说明,公共行政的本土研究绕不开全球化的背景,必须从全球化的角度着眼开展公共行政的本土研究。

其次就本土化来说,对于中国而言,公共行政学是一个“舶来品”。这就意味着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建立公共行政必须要移植国外公共行政学理论和经验。然而,在长期的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公共行政知识的同时,处在边缘位置国家的学者们会不自觉对处在中心位置国家的知识和文化产生心里依赖。在学习西方公共行政知识的同时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完全西方化了。这种现象会给公共行政学的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台湾学者叶启政在讨论社会学研究“移植性格”时指出,“一个社会的学术体系,若是无中生有地从外移植进来,这个学术体系的发展,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就会产生亦步亦趋的移植性格。……倘若社会缺乏产生自发性批判和反省的动力,那么,这种移植性格势必会一直延续下去,严重的将腐蚀了学术的原创活力,

终丧失了独立的学术风格。”<sup>[18]</sup>在公共行政学领域,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也形成了移植性格。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公共行政研究重心的“非中国化”问题。正是这种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移植性格”造成了很多问题,比如大部分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超前,也就是说现在公共行政学者研究成果的着眼点不是当下的公共行政实践问题,而是着眼于中国公共行政的未来。再比如,公共行政的移植性格造成了中国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鸿沟问题,造成了公共行政学者缺乏对中国真实世界的了解等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公共行政研究处于一个两难的矛盾境地。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公共行政必须走向国际;另一方面,中国公共行政学还需要解决中国公共行政实践中的问题。在走向国际化的同时,还需要树立中国公共行政自己的品格和学术的独立性。可见,公共行政本土研究内涵着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矛盾,需要解决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只有解决了这一矛盾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展公共行政的本土化研究。要在这个强者为尊的时代能够生存,并走向大国崛起。中国的公共行政必须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2) 公共行政本土化是世界公共行政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在全球化背景下,正确地看待国外先进经验和理论对中国公共行政本土研究至关重要。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然而,在公共行政本土研究过程中存在着接轨还是拿来的争论。王绍光在探讨政治学本土的议题时指出,“本土化当然不是要关起对外交流的大门。恰恰相反,本土化是要拓宽交流,使单行线变成双行线。本土化并不拒绝借鉴外来的概念、方法、理论,但反对来者不拒,反对盲目接受,强调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本土化政治学在批判地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政治学者对话,力争以我们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政治学的重建,将中国人看中国和世界的心得与各国政治学者共享。”<sup>[19]</sup>王绍光观点完全可以用在公共行政本土研究上。这就是说,公共行政本土化不是一味的情境化,而是超越传统国家本土思维和领土边界,发现可以融入本国环境的新思想和有益实践。公共行政本土化理论的建立不是与西方抗衡,而是站在全球化的角度,使中国公共行政学知识能够融入世界公共行政知识体系,成为世界公共行政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为人类文明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途径。

(3) 公共行政本土化是一个理论体系。公共行政本土研究是否就是情境化或区域化？这个问题是公共行政本土化概念重要内容。台湾学者叶启政认为，社会学研究本土化有两层涵义。就积极层面来说，它是社会学知识体系之在地传统的建立；二是就消极层面来说，它是针对外来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反省和批判，因此，本土化理论不但是问题的选择，而且是理论架构、概念，乃至研究方法的及工具的确立。尤其重要的是树立特有的人文取向的典范。<sup>[20]</sup>这就是说，公共行政的本土化不单是使公共行政的研究区域化或情境化，还包括根据具体情境和公共行政真实世界提出有效的概念、理论以及方法，并且树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价值取向。

#### 4 中国公共行政本土研究的进路

如何进行本土化研究？这是公共行政本土研究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公共行政的本土研究进路而言，我们认为需要以公共行政研究者的学术自觉为前提，从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三个维度展开公共行政的本土研究。

(1) 公共行政学者要自觉树立本土化研究的学术自觉。张康之在 2006 年曾撰文指出，面对复杂的新环境，中国的公共行政学者应该具有充分的学术自觉，立足于现实进行理论与方法的创新。<sup>[21]</sup>公共行政学者高度的学术自己对于中国公共行政本土研究来说相当重要。对于本土化来说，充分的学术自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共行政学者要自觉地对西方既有的理论论述体系有所考察，并加以严谨批判，尤其是针对隐藏在理论论述背后的哲学人类学的基本存有预设，应当给予考察、并有所批判。<sup>[22]</sup>二是要树立中国公共行政学的自主性。邓正来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全球化改革的时代，因此，需要重新思考中国在世界结构中的命运问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sup>[23]</sup>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影响，并不是中国社会科学缺失自主性的惟一原因，因为西方“文化霸权”的形成在当代中国并不是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被动者”转变成“主动者”之后才获得其实现的可能性的，亦即是作为中国论者的我们与这种文化霸权“合谋”的结果。<sup>[24]</sup>邓正来的研究对公共行政本土化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这就要求在构建公共行政本土化理论时，中国公共行政学者要警惕根植于我们头脑中的已经西方化了的思维模式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自觉地构建“中国式的公共行政理想图景”。

(2) 从本体论角度来说，要开展公共行政的本土研究必须重新厘定公共行政的所要研究的对象。不可否认，中国公共行政也存在着“移植性格”。在这种“移植性格”的影响下，中国公共行政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的影响。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国外公共行政的理论都扎根于他们所固有的、独特的本体性土壤。这也许是造成中国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公共行政研究的过程中必须从公共行政的本体出发，着眼于中国公共行政的真实的生活世界。从这个真实生活世界中寻找转型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展开研究。

(3) 从知识论角度来说，建构中国自己的公共行政知识体系。公共行政本土化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所谓中国自己的公共行政知识体系是指，一方面这个知识体系根植于中国行政文化情境，能够解释中国公共行政现象，解决公共行政实践的问题，为公共行政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这个公共行政知识体系还是世界公共行政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要做到建构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知识体系，首先，需要深刻反思西方公共行政知识体系。从知识发生学角度来看，任何概念和理论的建立都离不开其所在社会中的现实情境，受其社会种种条件的制约。尽管公共行政学具有科学性的特征，但这些工具性方法背后还是隐藏着文化因素。因此，中国公共行政本土化首先要从批判西方公共行政知识体系的前提入手，根据中国特有的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趋势创造性地建立中国自己的公共行政知识体系和学术评判标准，根据中国公共行政的真实世界发展出能反映中国现实的概念。其次，从中国公共行政的历史与文化出发，适当地建构一些本土性的概念以及理论。但公共行政知识体系的建构不是要闭门造车，脱离世界公共行政学主流。这就不仅要实现概念的中国化特征，还要在概念上实现与西方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对接。最后，需要建立和完善中国自己的关于公共行政知识评价标准。中国现有的公共行政知识评价标准大都是西方的评价标准，比如很多学术期刊都以西方公共行政知识评价为准则。这样的学术评价标准不利于中国公共行政本土性知识体系的建构。

(4) 从方法论角度来说，中国公共行政的本土研究需要适当的、契合中国实际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法可以作为中国公共行政本土研究方法：第一，中国本土化研究需要以根植于生活世界的真实问题为导向。要构建中国独立的公共行政知识体系，

必须扎根于中国公共行政的真实世界。在公共行政的真实世界中寻找中国公共行政发展所必须解决的真实问题,并通过综合性的学科知识予以研究和回应。这就需要打破学科界限,展开各种学科知识为背景的合作研究。第二,注重中国公共行政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中国行政实践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文化的传承性使得当代公共行政实践具有浓厚的历史烙印。只有从中国公共行政历史中才能理解中国公共行政的现在和未来。

##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1] Citing from Zhou Zhiren. On Innovation of The motivity mechanism of Administrative Reformation[J]. Administration forum, 2010, (2):1-2.  
转引自周志忍. 论行政改革动力机制的创新[J]. 行政论坛, 2010,(2), p1-2.
- [2] [18][20][22] Ye Qizheng. The Essay on Sociology Theory and Its Indigenization. Beiji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06:38-47,16,21,25.  
叶启政. 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p38-47, p16, p21, p25.
- [3]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M].Xinhua Publishing House, 2002:88.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新华出版社, 2002,p88.
- [4] See Zheng Yongnian. Experience and Puzzledom of China Model [M].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参见郑永年. 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M].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 [5] Chen Ruilian, Liu Yap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Globalization Era: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J].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Social and Science Edition) ,2003,(2):33-38.  
陈瑞莲, 刘亚平. 全球化时代的公共行政:危机与重构[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2), p33-38.
- [6] Wang Xin. The Crisis of Self-decision of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its Reconstruction [J]. Social Sciences in Nanjing, 2000, (9): 35-41.  
王欣. 中国公共行政自主性的危机与重构:对来自 WTO 挑战的一项探索[J]. 南京社会科学, 2000,(9), p35-41.
- [7] Deng Zhenglai. An Open "Concept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e China[J]. Hebei Law Science, 2008, (6).  
邓正来. 开放的“全球化观”与“主体性”中国的建构[J]. 河北法学, 2008,(6).
- [8] He Yanling. "What We Do Research Now": Review on Research of China Administration (1995-2005)[C].Majun,Zhang Chengfu, The Reflection of Chinese Administration: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M].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9: 13-40.  
何艳玲.“我们在做什么样的研究”:中国行政学研究评述(1995—2005)[C]. 马俊, 张成福等主编.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危机与重建[M].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p13-40.
- [9] [15] Ma Jun, Liu Yaping. Identity Crisis of Chinese Administration[J].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07, (4): 8,8.  
马俊, 刘亚平. 中国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7,(4), p8, p8.
- [10] Zhang Jinsong. On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in Chinese Public-Administration and it's Governance[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4,(1):65-69.  
张劲松. 论我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及其治理[J]. 中国行政管理, 2004,(1), p65-69.
- [11] See Bo Guili. Chinese Administration: Issue, Challenge and Countermeasure [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1998,(12); Ma Jun, Liu Yaping. Identity Crisis of Chinese Administration [J]. Journal of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2007, (4).  
参见薄贵利. 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 中国行政管理, 1998,(12), p4-7; 马俊等. 中国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7,(4), p8-12.
- [12] Zhang Chengfu. Reconstruction Public Theo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J].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07,(4):1.  
张成福. 重建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7,(4):1.
- [13] Zhang Chengfu.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Chang Age: Development and foreground[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8,(9):13, 8-13.  
张成福. 变革时代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发展与前景[J]. 中国行政管理, 2008, (9), p13, p8-13.
- [14] Rui Guoqiang. the indigenization of Administration: Connotation, Meaning and Method[J]. Journal of Jianghai Academic, 2008,(6):93-94.  
芮国强. 行政学本土化:内涵、意义及路径[J]. 江海学刊, 2008,(6):93-94.
- [16] Ren Xiaolin. The Public Management to indigenization Research :Limit, Logic and the basic relationship[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2,(10):50,50.  
任晓林. 走向本土化研究的公共管理:有限性、逻辑与基本关系[J]. 中国行政管理, 2002,(10):50:50.
- [17] Ye Qizheng. The Essay on Sociology Theory and Its Indigenization. Beiji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06:35.  
所谓生机控制性是指一个个体或群体所具备保证自身或其成员足以控制外在环境,以谋维持独立生存的机会或保证人格发展的有利条件的程度。参见叶启政. 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p35.
- [19] Wang Shaoguang. Disenchantment And Transcend[M].China CITIC Press, 2010:18,18-22.  
王绍光. 祛魅与超越[M]. 中信出版社, 2010,p18, p18-22.
- [23] [24] Deng Zhenglai. Contemporary Mission of Social Science in China[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08,(7):4-11,6.  
邓正来. 中国社会科学的时代使命[J]. 社会科学, 2008,(7), p4-11, p6.